都是记录这些底层农民的诉说。他们的泪与笑，他们的爱与痛，在梁鸿的笔下，在梁庄女儿的笔下，泪泪流淌。

重返我们曾经逃离的故乡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岁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，就一直在梁庄吗？

梁鸿：实际上21岁之前，我都在以我们老家为中心的县城附近生活，上了3年中专，又回到乡村教书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乡村教师是在梁庄吗？

梁鸿：在另一个村庄。经过我们老家的那条河，也穿越了其它好几个村庄，像我曾经教书的乡村学校，就在河的下游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是不是到了北京以后，才有了故乡的强烈感觉？

梁鸿：其实我觉得“故乡”这个词是比较游移的，我原来去师范读书的时候，一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，这个过程中，也挺想家的。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、定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故乡，变成了你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地方。它是慢慢形成的，随着距离的增加、年龄的增长，故乡，才变得清晰。很难说哪一个时刻，它变得如此强烈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有篇访谈，题目是“重返我们曾经逃离的故乡”，是不是可以说，你离开故乡时，是“逃离”的？是拼命想要离开农村的？

梁鸿：“逃离”这个词可能太过动词化了，不过你想一个农村的孩子，那么努力读书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离开农村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就是要逃离农村困苦的生活境遇。

左上图：《中国在梁庄》。
右上图：《出梁庄记》。

确实，一代代的人都在逃离乡村，试图找到更好的生活。当你已经走出农村，进入城市，有了家，再回过头来看家乡，这就是重返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08年回到家乡，怎么想到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写梁庄？

梁鸿：我想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要书写的，就是你的家，你的童年——和你有关的事物。在我心中，对我至关重要的，还是家乡。所以非常自然的，想要写梁庄，想要回到我的童年。

其实我每年放寒暑假都会回家，听我们的老支书讲顺口溜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开心果。我觉得写作是慢慢累积的过程，只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要去书写它，要进入他们灵魂的深处。这样一年一年的累积是必不可少的。

当时我不想写成小说，当然也不想写成论文，就想了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写，也是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，慢慢形成了这种比较现场化的书写，有点类似于人类学的观察。到了后来才有非虚构的概念。并非是有了非虚构的概念，再去写《中国在梁庄》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父亲带你去采访的？

梁鸿：其实也谈不上“带”。我父亲和我一起在村庄里聊天，一开始也是无意识的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父亲的角色非常重要，他到哪一家都知道哪一家的历史，好多你不知道的故事，慢慢，一个村庄的历史轮廓就浮现在你眼前了。而到我写《出梁庄记》的时候，我和我父亲那就真正是一种合作关系了。他和我一起去外地找那些老乡们。

梁庄有一定的代表性

《新民周刊》：因为你用的是“中国在梁庄”这个标题，是不是认为梁庄是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现状的？或者说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？

梁鸿：没有那么大，这只是个题名。不过呢，题目有一定的象征性，实际上，梁庄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它既不大也不小，既不富也不穷。这样一个村庄的生活，这样一个村庄的境遇，可能会是中国很多村庄的影子，所以我觉得用“中国在梁庄”这个题目也不为过。在中国，像南方有的村庄特别富裕，这要细究起来，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境遇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三农问题”是当今中国的一大难题，觉得解决之道在哪里？

梁鸿：这恐怕不是作家能够回答的问题，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将生活的内部场景非常细致、非常深入地书写出来，至于解决之道，需要政治家社会学家来梳理、解决。我们能提供的只是一个村庄的场景、状态，很难提出解决方案。

我希望在这些真实的村庄场景